

芬蘭適應政治的歷史分析—— 在「芬蘭化」以前*

范盛保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芬蘭在「芬蘭化」以前的適應政治。筆者先從適應政治的模型勾勒出位於強鄰的芬蘭可能對應的生存模式。接著按歷史進程，分析芬蘭與瑞典、俄羅斯的分離競合，並介紹芬蘭在不同時空背景的與強鄰的相處方式，文末也藉著芬蘭的模式，給台灣的生存帶來想像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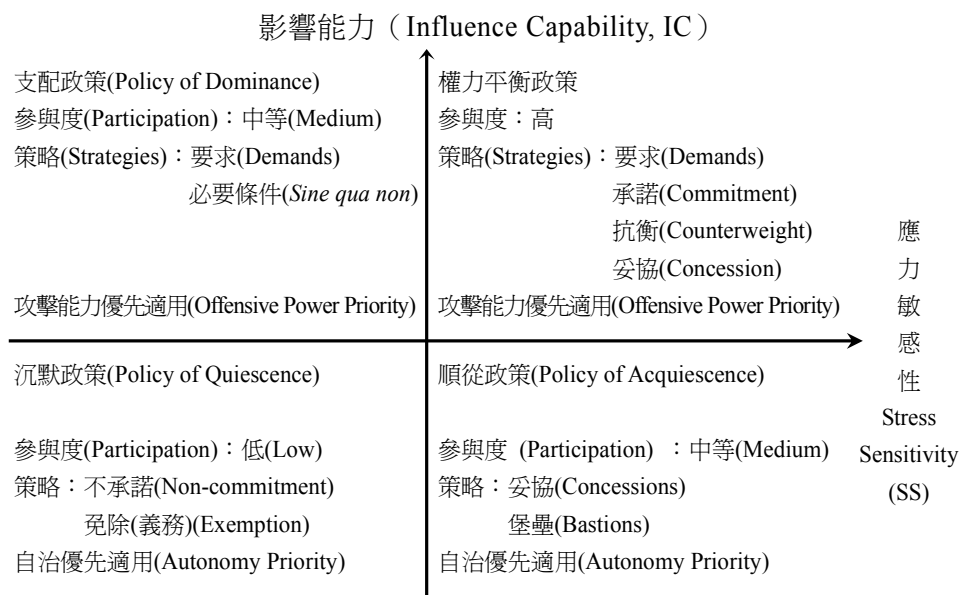
關鍵字：適應政治、芬蘭化、俄羅斯化、冬戰、續戰

* 本文原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所主辦之「瞭解當代芬蘭民主政治」研討會（2009/10/16）。感謝評論人劉德海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的批評與建議，使本文在修改上獲得更多面向的思考。

壹、適應政治與芬蘭化

適應政治理論假設外交政策制定者能很「巧妙的處理」(manipulate, 有譯作操控)國家內部及外部環境的平衡,以求在逐漸互賴的國際體系中,確保國家內部社會結構具足夠的功能性。Petersen (1998: 41-46)認為國家依自身條件在「適應政治」的架構中可以區分為四種應對模式(如圖一),這四種模式取決於國家對於外部環境控制力(影響能力, influence capability, 簡稱 IC)以及國家對於外部環境的應力敏感度(stress sensitivity, 簡稱 SS)。第一種環境是高 SS 與高 IC,所代表的是國際間的互相讓步,雙方遷就(give and take),大家相互妥協。高 SS 與低 IC 所代表的則是外部環境限制政策制定者默默順從某項政策,甚至常是外部環境突然要求當事國配合執行。低 SS 與高 IC 所代表的是允許政策制定者主導外交政策,主政者可以將其價值與偏好加諸於政策制定過程。最後一種是低 SS 與低 IC,所代表的是當事國的政策與外在環境互動不多,權力不平衡情勢較少發生。

相較於適應政治,「芬蘭化」這個概念就有些爭議了。當我們在台灣用「台灣化」這個概念時,直覺上會認為台灣走向在地化,本土化,似乎這是一個正面的概念。但在芬蘭用「芬蘭化」卻是一個負面概念,這個概念是從冷戰時期芬蘭和蘇聯的關係中引申出來的。二次大戰後芬蘭因害怕擁有核武器的蘇聯,最後身不由己的依附於蘇聯,在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和西方自由世界發生衝突時,被迫採取所謂「中立」和「不說話」的態度。1947年芬蘭和蘇聯簽訂了條約,建立了芬蘭在外交和國防事務方面的中立性。由於莫斯科的反對,芬蘭不參加『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芬蘭在外交與國防事務上,處處以中立自居,關注的全是「不激怒蘇聯」。當時的「芬蘭化」更暗喻著芬蘭是個「搭便車者」(free rider)或是騎牆派(fence sitter) (Frankel & Quenoy, 1999: 108)。



資料來源：Petersen (1998: 42)。

圖 1：適應政治模式和策略

儘管「芬蘭化」所代表的概念似乎是一個負面代名詞，卻也有人認為「芬蘭化」是一個成功的概念，最起碼芬蘭沒有遭遇東歐國家所面臨的共產政權的全面執政，而且蘇聯在東歐的全面性控制並沒有發生在芬蘭。Soares (2004: 125) 認為「芬蘭化」是一個特例，不可能發生在其他東歐國家。他認為芬蘭有四個獨特因素催化了「芬蘭化」。其一是芬蘭政府普遍授芬蘭人擁護；其二是相較於東歐的階級鬥爭，芬蘭社會比較有平等主義概念。第三是芬蘭內部保守主義的因子較希望與蘇聯維持好的關係。第四個因素是與芬蘭的戰鬥力有關。蘇聯不擔心芬蘭的鄰國會藉由芬蘭繞路進攻蘇聯，特別是冬戰與續戰，芬蘭軍隊表現的戰鬥力證明了芬蘭人為了保持芬蘭獨立，會很有效率的抵抗外來侵略。而美國時任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也曾經認為「芬蘭化」這個模式的中立主義可以削弱蘇聯對東歐的控制，縱令芬蘭的例子無法與東歐國家相比，「芬蘭化」模式的存在對美國而言仍是很好的宣傳 (Ruddy: 549)。

另有學者認為「芬蘭化」根本是個無意義的名詞。Lukacs (1992: 61)

認為這個名詞是由德國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Franz-Josef Strauss 所創，這個概念認為，冷戰期間由於蘇聯影響力與日俱增，蘇聯或許可以藉由允許東歐某些國家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自由，如同蘇聯對芬蘭般，用來換得蘇聯限制這些國家獨立性的權力，特別是針對他們的外交政策。事後證明，蘇聯雖未如此做卻仍長期穩固的控制東歐國家，「芬蘭化」，或者應該說是「東歐芬蘭化」，自始至終完全不存在。Lukacs 認為「芬蘭化」的意涵是外部環境期望這個概念能延伸到東歐國家，但這個概念卻僅用於芬蘭，而且只有芬蘭這個例子。

上述二種說法，一是認同「芬蘭化」概念的存在，並以此概念極力宣揚；另一則是完全否定此概念的存在。本文無意為「芬蘭化」的概念另作詮釋或爭論「芬蘭化」存不存在，僅探究「芬蘭化」概念成型前芬蘭主權的更迭，並論述不同模式的適應政治在某種層面上可詮釋芬蘭在被「芬蘭化」前的對外關係。

貳、芬蘭主權的轉變

芬蘭，這個人口 5 百多萬的國家，有 93% 的芬蘭人 (Finnish) 以及少數的瑞典族及薩米爾族。宗教上芬蘭新教教徒佔總人口近 9 成，1919 年的憲法規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1 成的少數宗教徒包括了東正教信徒、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 (董小川，2008：121-22)。芬蘭有近 34 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地處瑞典與俄羅斯之間。在他南方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東歐諸國在冷戰期間因地緣政治因素都成了蘇聯的衛星國家。芬蘭雖逃過共產主義的赤化，但因冷戰時期的對外關係，卻使芬蘭的適應政治成為政治領域中值得探討的現象。

公元 12 世紀以前，芬蘭人主要從事原始的農業、漁業和狩獵。從 12 世紀中葉以後一直到 20 世紀初，芬蘭一直處在異族統治之下。1155 年瑞典十字軍入侵芬蘭，傳入基督教文化。1293 年瑞典攝政王 (regent) 克尼特松

(Torgils Knutsson, 常被稱為 Marshal 陸軍元帥) 挑戰諾夫哥羅德公國 (Novgorod Republic, 從波羅的海延伸到烏拉山的國家), 企圖攻占卡累利阿 (Karelia, 現今蘇芬交界處)。戰爭持續到 1323 年, 簽訂『諾捷堡條約』 (Nöteborg Treaty), 自芬蘭灣東部, 經卡累利阿中部向西北而至波斯尼亞灣畫一條粗略的線, 作為俄、瑞雙方勢力範圍的分界。至此, 芬蘭歸屬瑞典, 一直到 1362 年芬蘭才正式成為瑞典王國的一部分。在瑞典近 7 個世紀的統治裏, 瑞典對芬蘭並非以戰爭和掠奪的方式, 而是依靠漸進、和平的滲透, 甚至讓芬蘭人享有與瑞典人同等身分參加國王的選舉 (謝曙光、何侃, 2004: 174-75; 王屏、管媽紅, 2008: 21)。瑞典在這段時期的統治主導了芬蘭的政策走向, 而芬蘭對於瑞典的應力敏感度似乎建議順從統治者是芬蘭生存的必要條件, 這段時期芬蘭的適應政治模式較接近低 IC 與低 SS。亦即, 芬蘭人參與瑞典統治者的程度僅止於極少部分, 所享有的權力來自於瑞典的首肯。

『諾捷堡條約』中議定諾夫哥羅德公國割讓三個卡累利阿的教區給瑞典, 瑞典則不介入諾夫哥羅德公國與納爾瓦 (Narva, 愛沙尼亞境內) 之間的衝突。此條約的簽訂排除了芬蘭傳統鬆散部落的參與, 他們的命運完全任由俄、瑞決定。『諾捷堡條約』簽定後, 瑞典逐漸自『諾捷堡條約』北方界線持續往更北方擴展, 最終, 這些領土構成今日所熟悉的芬蘭。

1362 年瑞典國王哈康 (Haakon) 確立了芬蘭人參加瑞典王國選舉的權利以及芬蘭與瑞典王國其他部分的平等地位, 但在幾年以後, 哈康被推翻, 梅克倫堡的阿爾貝特 (Albert of Mecklenburg) 登王位。阿爾貝特不受芬蘭人擁護, 到了 1374 年, 瑞典貴族格里普 (Bo Jonsson Grip) 獲得了統治全芬蘭的爵號。格里普卒於 1386 年, 其後不久芬蘭成為由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組成的卡爾馬聯合 (Kalmar Union, 統一丹麥、挪威、瑞典的個人聯合) 的一部分。被瑞典統治期間, 芬蘭貴族享有政治權力, 瑞典語是芬蘭唯一的官方語言, 依附在瑞典底下看似非常美好。但發生在 17、18 世紀的俄、瑞兩個主要戰爭, 卻令芬蘭人重新思考依附瑞典的代價。

叁、芬蘭意識的萌芽

在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1697-1718) 與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82-1725) 時期, 瑞典與俄國因控制波羅的海問題而發生大北方戰爭 (Great Northern War, 1700-1721)。1714 年俄羅斯佔領了芬蘭, 1721 年蘇俄同意撤離大部分芬蘭, 但換來的是佔領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此一戰爭使芬蘭人口驟降一半, 從約 100 萬人降至 50 萬人, 芬蘭人稱之為大天譴 (Great Wrath)。20 年後瑞、俄戰爭期間 (1741-43), 俄國再度佔領芬蘭, 俄國女皇伊利沙白建議芬蘭接受在俄國保護下自治, 俄國只兼併一小片土地 (Kubicek, 2003: 500)。作為瑞典的一部分, 芬蘭實際上沒有自己的機構, 但是自 18 世紀中葉起, 大多數官員和知識界人士已是芬蘭血統。這些人士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 瑞典人在外交上好大喜功, 而由芬蘭人承擔其代價。上述這兩場戰爭使得芬蘭人懷疑瑞典的保護能力。

俄羅斯統治下的芬蘭政體是由 1809 年的波爾沃 (Porvoo) 議會制訂的, 在 1809 年晚些時候締結了『哈米納和約』 (*Peace of Hamina*)。締結這項和約以前, 芬蘭在形式上仍然屬於瑞典, 但是, 芬蘭領導人物已經厭惡瑞典的統治, 轉而要求在俄羅斯保護下能獲得更多的自治。芬蘭雖不具支配政策角色, 但其拉攏俄羅斯這個舉動可以被看成是一種高 SS 與低 IC 的妥協策略, 芬蘭雖順從於俄羅斯的統治, 但亦知悉運用妥協概念在瑞典與俄羅斯間生存。在波爾沃議會上, 芬蘭第一次被確認為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國家。俄皇亞歷山大一世表示願意承認芬蘭的憲政, 允許芬蘭在他的統治下享受自治, 成為大公國。在俄羅斯統治的百餘年間, 約可粗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自 1809 年至 1862 年, 在此期間, 大公國的有關當局成功地說服了俄羅斯法院, 大公國當局以及所有芬蘭人對俄國忠誠。第二時期自 1863 年至 1898 年, 芬蘭逐漸獨立, 包括重新建立芬蘭國會並將芬蘭語言從一般人民之用提升至與瑞典相同地位的國家語言。第三時期自 1899 年至 1917 年, 俄皇企圖俄羅斯化卻未盡其功。

亞歷山大一世一方面承認芬蘭自治, 另一方面許諾尊重芬蘭的宗教信

仰和根本性法律 (Kappeler, 2003: 1021)。用亞歷山大一世的話來說，芬蘭得「以國家等級存在、以自有法律治理」(take its place in the rank of nations, governed by its own laws)。1809-63 年，統治芬蘭的是由俄皇遴選的一批官僚，由一名總督代表俄皇駐在芬蘭。對於芬蘭人來說，「官僚統治時代」是太平繁榮、百業興旺的時代。但此間芬蘭卻也經勵民族覺醒 (national awakening)，藉由藝術、語言、文化、政黨等議題激起芬蘭人民族意識。Anssi Paasi (1997: 44-45) 認為這段期間有兩個重要因素決定了芬蘭的國家認同，除了首府赫爾辛基的成長外，最主要的還是芬蘭史詩 *Kalevala* (《卡勒瓦拉》) 的誕生。

一直到 19 世紀中葉，芬蘭政府內部只允許使用瑞典語。用芬蘭語寫作的著作極為稀少，大學與中學一律使用瑞典語授課。根據 1850 年關於芬蘭語的法令，除為了宣傳宗教和謀求經濟效益以外，一律不許用芬蘭語出版書刊 (張亞中 2008: 185)。許多重要的 19 世紀芬蘭作家，終身用瑞典語寫作。甚至在芬蘭 1917 年獨立前，由於說瑞典語的變成了少數民族，芬蘭政府卻又在同時壓迫瑞典族人，結果產生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識分子和詩人，維護瑞典族人的語言和文化。這也使得芬蘭的瑞典語文學可以和瑞典文學相媲美 (北島, 2004: 8)。

在 19 世紀後半葉，芬蘭語派人士開始用芬蘭文記錄民謠和其他作品，逐漸形成了芬蘭語文學。1863 年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發布諭令，謂經過 20 年的過渡時期，各政府機關和法院可以根據各自對公眾的關係平等地對待瑞典語與芬蘭語。但是，瑞典語仍是國內行政用語，直至 1902 年，芬蘭語才與瑞典語平起平坐，共為正式語言。

這段期間最重要的文學成就是由芬蘭醫生艾里阿斯·隆洛特 (*Elias Lönnrot*, 1802-1884) 所收集的大量民歌，編成一部完整的史詩——《卡勒瓦拉》(芬蘭語: *Kalevala*)。《卡勒瓦拉》是芬蘭的口傳文學，它包含了神話史詩、英雄詩篇、傳說、抒情詩、頌歌與童謠，也有描述芬人與薩米人的戰爭故事。19 世紀到 20 世紀之間，許多芬蘭藝術家都從這部史詩獲得靈

感，作曲家西貝流士 (Jean Sibelius, 1865-1957) 也以這本巨冊為藍本，完成許多交響曲。《卡勒瓦拉》被認為鼓舞了民族主義，並最終促使芬蘭於 1917 年從俄羅斯的統治之下獨立。

國界地圖的浮現可以視為芬蘭由地區轉向國家定義的重要因素。19 世紀中葉以後漸興的民族主義導致新繪國界地圖的誕生。地圖冊以及地理的教科書漸有「芬蘭定義」以及「芬蘭在領土實體」所代表的意義。特別在「俄羅斯化」時期，地理學者非常積極的藉由發行國家地圖冊來界定國家空間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地理教科書也陳述了芬蘭民族是一個獨特的民族，甚至擁有特定的刻板印象 (Anssi Paasi, 1997: 46) 。

肆、芬蘭「俄羅斯化」

芬蘭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 則是最終激起芬蘭人認同並進而要求獨立的轉捩點。「俄羅斯化」所牽扯的三方勢力包括了俄國本身、芬蘭的地方勢力以及芬蘭農民。俄羅斯支持芬蘭農民，對抗上層階級的紳士或上流人士，並藉由引入芬蘭語，甚致同意芬蘭語與瑞典語有同等地位，加速芬蘭境內芬蘭意識的擴散，並激起芬蘭人反對芬蘭被併入俄國。

對於俄羅斯而言，德國和英國都被看成是從波羅的海攻擊俄羅斯的主要敵人。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芬蘭是否會對俄羅斯保持忠誠則是啓人疑竇的。1898 年俄羅斯軍事大臣庫羅帕特金 (Alexei Nikolayevich Kuropatkin, 1848-1925) 在給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1868-1918) 的奏章中指出：「爲了帝國的利益，應當統一軍事體制並消除芬蘭的特殊性」。芬蘭的「俄羅斯化」(1899 年至 1905 年，1908 至 1917 年) 旨在廢除芬蘭的文化和行政自主權。一直到芬蘭於 1917 年獨立前，「俄羅斯化」成爲芬蘭無孔不入的議題。該政策包括以下三大措施 (Solsten & Meditz, 1988 ; 孟君，2008 : 142-43) ：

第一、1899 年的『2 月宣言』 (*February Manifesto of 1899*) ：尼古拉

二世規定，凡在帝國立法體制中有規定的全國性問題，芬蘭議會只有諮詢性作用，他們的反對意見不能阻礙法律在芬蘭的生效。2月公告確立了一個事實，亦即芬蘭的全國性法律要在俄國基本法規定的程序下進行草擬與制定。芬蘭人的反應則是非常激烈，請願抗議在全國迅速傳開，芬蘭人收集了50多萬個請願書的簽名。1899年3月，這些請願書提交給了沙皇，沙皇選擇不加理會。

第二、1900年的『語言宣言』（*Language Manifesto of 1900*）：沙皇尼古拉二世規定，1905年以前，俄語要逐步成為芬蘭國會、中央直屬部門及地方部門的公務語言。芬蘭人在如何面對俄羅斯化主張分歧。那些最反對俄羅斯化的是立憲派，他們堅持芬蘭傳統的制度與政府，他們希望俄羅斯政府尊重他們。立憲派組成政治戰線（*political front*），被稱為年輕的芬蘭人（*young finns*）。另一派被稱為老芬蘭人（*old finns*），代表順從俄羅斯化的政治主張，老芬蘭人一方面承認自己對於俄羅斯化的無能為力，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利用俄羅斯的影響，逐步削減在芬蘭國度仍說瑞典語的人的影響力，這些老芬蘭人亦被稱之為順民（*compliant*）。

第三、1901年的『兵役法』（*Conscription law*）則是第三個「俄羅斯化」的措施。根據該法，芬蘭軍隊被解散，芬蘭人被納入到俄羅斯軍隊中服役。芬蘭人再次大規模的請願，並輔之以消極抵抗。根據新的法律在1902年芬蘭男子首次被召集從軍，他們以軍隊罷工方式反映對此政策的不滿，只有大約一半的人報到。1903年拒絕報到的比例上升至三分之二，並在1904年達到五分之四。這次不順從的舉動令俄羅斯軍事指揮部深信，芬蘭人在軍事上是不可靠的。芬蘭人不再服兵役，換之以付出額外稅收。

1905年至1907年俄羅斯帝國經歷了社會秩序動盪及日俄戰爭失敗，減緩了對芬蘭「俄羅斯化」的壓力。1908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又重新考慮取消芬蘭自治。芬蘭的「俄羅斯化」運動遇到莫大阻力，請願和罷工升級，最終積極抵抗並暗殺俄羅斯總督博布里科夫（*Bobrikov*）。Taipale（2007: 68）在他的著作《芬蘭的非暴力反抗運動》中提到：「芬蘭人的反抗運動必須超

越抗議、申訴、請願、演說等手段，訴諸不合作與國民不服從，此外，芬蘭人也用社會杯葛等手段來對付俄國人和附庸俄國的芬蘭人」，而芬蘭人也的確如是做了。

同一時期沙皇政府頒布了『關於帝國發布法律或政令之程序——對芬蘭的意義』(*Concerning the Procedure to Be Complied with Issuing Laws and Decrees of All-Empire-Significance in Finland*)，其中規定：芬蘭對帝國的貢獻，包括了徵費和稅收；芬蘭對帝國有軍事義務；俄國子民在芬蘭的權利；帝國語言在芬蘭的運用；帝國當局的權利和義務及其行動秩序；確保帝國在制訂教育課程和教學監督的利益；在芬蘭的新聞立法以及在芬蘭進口的印刷品立法；對於芬蘭的海關、關稅、工業、商標、專利、文學、藝術作品版權、金融體系、郵局、空中航行、通訊等的規範；芬蘭的鐵路等交通運輸需配合帝國的國防需求等。

這個法令引起芬蘭各界不滿，多數的法律學者和官員都認為此法令因違反當年亞歷山大一世的公告，彼時公告中曾指出：「任何未經議會同意而涉及芬蘭的都不能頒布廢除或改變」。但俄羅斯政府認為此法令是有效的。沙皇並在 1912 年提出另兩項法令，第一項法令規定，芬蘭應當向帝國國庫提交一定稅款，承擔一定軍事預算（雖亞歷山大一世曾於 1809 年聲明芬蘭的收入只用於自身需要）。第二項法令則規定帝國所有高等學校畢業生都有權進入芬蘭擔任國家職務，此舉讓帝國內支持芬蘭俄羅斯化的官員得替換掉芬蘭境內支持芬蘭自治的官員（孟君，2008：143）。上述這段芬蘭與俄羅斯的百年互動，芬蘭從最初的妥協，到漸進的要求，從期望「芬蘭自治」，到最後走向獨立，在在凸顯芬蘭的應力敏感性與影響能力正逐漸增強中。

伍、芬蘭的獨立與蘇、芬糾葛

芬蘭的獨立源起於俄帝的瓦解。1917年11月當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派掌權後，芬蘭國會立即發布了聲明，宣稱：「從現在起所有主權權力均屬芬蘭」（for the time being, all powers of the Sovereign in Finland）。芬蘭的『獨立宣言』，除了一般常見的解釋獨立原因外，例如，她宣稱：「芬蘭人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並因現狀採何理化要求。芬蘭人民深深感到，若沒有一個完整的主權，他們不能履行國家義務和普遍人權的義務。對自由渴望等著被實現，芬蘭人民向前邁進作一個獨立國家」。較特別的是，她把俄國的角色作一個正向詮釋。

不像『美國獨立宣言』數落了英國的惡行惡狀，芬蘭在其『獨立宣言』中陳述：「俄羅斯人民經過顛覆沙皇制度，在一些場合表示，他打算贊成芬蘭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基於其悠久的文化發展。對戰爭的恐懼所表現出聲音，已及目前戰爭所著眼的目的，咸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將被迫違背其意願而依賴於其他國家。芬蘭人認為，自由的俄羅斯人民和國民議會的組成不想阻止芬蘭的願望成為自由和獨立的國家。與此同時，芬蘭人民敢於希望其他國家承認完全獨立和自由的芬蘭人民將各盡其能，履行義務，於文明世界中爭取獨立地位」。整篇『獨立宣言』除盛讚俄羅斯外，看似有那麼一些期待俄國的諒解，卻又害怕觸怒這個強鄰。

Petersen (1998: 41-42) 在描述「芬蘭化」過程中應用了適應政治中的四個策略，這四個策略分別是「妥協」(concession)、「不承諾」(non-commitment)、「堡壘策略」(bastion strategy) 以及「抗衡策略」(counterweight strategy)。將此四個策略套用在「芬蘭化」前的芬蘭，似乎可以合理詮釋近 8 百年芬蘭與瑞典、俄羅斯的相處模式。妥協策略是因外在影響力而犧牲價值與部分利益，芬蘭的確處處與瑞典、俄羅斯妥協。不承諾則是避免可能限制國家自治的情事，1900 年的『兵役法』看見的是芬蘭男子拒絕被徵召的不承諾作為。堡壘策略旨在保護特別敏感和切身利

益，透過口頭或其他形式的自我承諾，築成一道防線。1899 年的『二月宣言』芬蘭以請願方式遞交抗議聲明，表達口頭訴求。最後一個是抗衡策略 (counterweight strategy)，尋求同盟以求其支持特定政策，從歸屬瑞典轉換成歸屬蘇俄正是尋求同盟的支持。

雖然芬蘭深受蘇聯影響，卻也一直在找機會疏遠這個俄國老大哥。1910 年時約 27% 的芬蘭輸出是到俄國，1930 年時，僅剩 0.5% 輸出到彼時的蘇聯 (Paasi, 1997: 47)。芬蘭盡力在與西方建立關係，同時間也被迫和蘇聯友好。蘇聯因滿洲國的問題開始跟歐洲鄰國談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要確保其邊界完整，蘇聯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亦簽訂『互不侵犯條約』。1932 年芬蘭、蘇俄締結『蘇、芬互不侵犯條約』 (Soviet-Finnish Non-Aggression Pact)，雙方保證尊重國家之間的邊界，並同意保持中立，爭端和平解決。1934 年時雙方再簽定延長此『互不侵犯條約』10 年，至 1945 年 12 月 31 日。

雖然彼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芬蘭仍然視俄羅斯為傳統敵人。David Arter (1995: 363) 替 1939 蘇、芬衝突前所訂下的『互不侵犯條約』下註解稱「此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是一個可憎想法」 (the possibility of peace cohabitation was anathema)。至於「與隔壁大熊 (bear next door) 相處的方式」則被認為是努力不夠。這算是芬蘭的宿命嗎？如 Ryan (1997: 48) 所言，「頗大的小國家對抗頗大的惡勢力國家」 (a big little country v.s. the big bad bully country)。

二次大戰期間蘇、芬之間的二個戰爭亦牽動著彼此關係。蘇、芬之間的冬戰，起因不單僅源自於當事國，主其事者還包括德國。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尋找任何可能藉口，以奪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的波蘭。1938 年 4 月，蘇聯和芬蘭進行外交談判，希望和芬蘭聯合抵抗德國，並希望芬蘭將列寧格勒外圍領土和蘇聯北方領土交換，以達到保護列寧格勒的目的。但談判了一年都沒有實質性結果。德國為了防止其東部邊境來自俄羅斯可能的攻擊，1939 年 8 月 23 日，史達林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它包括幾個協議：締約一方如與第三國交戰，另一締約國不得給予第三國任何支持；條約締結雙方保證不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彼此間施用武力、侵犯或攻擊行爲；德國有權拿走波蘭，除了 4 個最東邊的國家（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秘密協議將此四個國家留給史達林，如果史達林能拿走的話。

9 月 1 日德國進攻波蘭，11 月 30 日 25 萬的俄羅斯軍隊趁勢越界進入芬蘭。梅列茨科夫（Kirill Afanasievich Meretskov）將軍估計「走進」（walk over）芬蘭只需 10 至 12 天即可到達赫爾辛基。俄羅斯的宣傳甚至很確信的認爲芬蘭人將揮舞旗幟張開雙臂歡迎紅軍。迎面而來的是裝備很差的 1 萬 1 千名芬蘭軍隊。這場戰爭進行了 105 天，蘇俄平均每天死亡 1 萬人，芬蘭在西方國家的協助下，每天卻僅 250 人死亡。到了 1940 年 3 月 13 日的停戰日止，芬蘭約 2 萬 5 千人死亡，5 萬 5 千人受傷，45 萬人無家可歸，對於彼時人口僅 4 百萬的芬蘭而言，是個極大的損失。但相較於蘇俄的近 1 百萬人死亡，芬蘭看起來是贏了，但仍付出非常大的代價。雙方簽訂了共九條的『莫斯科和平條約』（*Moscow Peace Treaty*），芬蘭割讓自身的卡累利阿、整個卡累利阿地峽以及一大片卡累利阿北部的拉多加湖（該地區包括該國第二大工業大城維堡省 Viipuri）。芬蘭失去了約 10% 以上的戰前芬蘭領土以及 12% 的人口（多爲卡累利阿人）。莫斯科條約對芬蘭人而言似乎太嚴苛了，許多西方國家對芬蘭遭遇表達同情，而國際間的同情也真的僅止於同情。對芬蘭而言，這又是一次適應政治中強權的高 SS、高 IC 與小國的低 SS 與低 IC 的體現。當芬蘭仍須獨立面對自己的鄰居時，他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儘管蘇聯已在莫斯科簽署的『和平條約』中承諾芬蘭人，它不會干預芬蘭國內政策，但事實卻相反。蘇聯要求取得芬蘭工業城拉恩索，蘇聯支持芬蘭境內的極端左翼組織—蘇、芬友誼聯盟（主要訴求是要求芬蘭加入蘇聯）。蘇聯對芬蘭一再的恫嚇，迫使芬蘭尋找其他國家支持，以維持芬蘭的獨立性，而芬蘭找的老大哥是德國。這仍脫不出適應政治中的抗衡策略（counterweight strategy）——尋求一個同盟國。蘇聯在法國拿破崙時代以及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二度被歐洲國家蹂躪，希特勒策劃成爲第三個入侵俄羅斯的外國勢力。由於芬蘭與德國鈞擔心蘇聯可能進攻芬蘭，兩國在 8 月 18 日達成了一項協議，允許德國建立基地。德國軍事援助芬蘭的交換條件是，一但芬蘭和蘇聯交戰，德國提供食物、武器、燃料、裝備等支援芬蘭，芬蘭開放通往瑞典挪威的鐵路供德國運送軍隊和物資。芬蘭同時間保證，未經德國同意，不得和蘇聯片面停戰或議和（吳祥輝，2008：89）。

時任芬蘭總統是呂蒂（Risto Ryti）。他在冬戰之始被選爲首相，他著重在現實的分析，而不是悲觀或明顯樂觀的情緒。他曾說服內閣大臣簽下『莫斯科和平條約』，向蘇聯臣服。如今，他又要改變他的政策走向，從傳統的斯堪的納維亞導向，改爲德國導向。原因在於波羅的海已完全由德國掌控，他必須尋求德國首肯進行貿易。呂蒂更進一步與德國合作，因爲他看見與德國合作的國家利益可奪回冬戰失去的領土，而呂蒂也真的贏回部分卡累利阿。

呂蒂原是於 1940 年 12 月接替因病無法視事的總統卡里奧（Kyösti Kallio）的任期，任期應至 1943 年。戰爭期間政府無法舉行選舉，國會直接修改憲法，讓呂蒂繼續擔任總統。1944 年 6 月蘇聯展開反攻，芬蘭亟需德國在食物及武器上的奧援。在德國要求下，呂蒂承諾絕不私下和蘇俄簽定停戰。但當德國大勢已去，呂蒂被迫辭職，使芬蘭新政府得以和蘇聯展開和平談判。呂蒂並在蘇聯要求之下被逮捕，以戰犯之名被判刑 10 年。蘇聯解體後，呂蒂的名聲被公開回復，但並非由官方宣布。政府的立場很簡單，呂蒂及其協從者的榮耀從未在芬蘭歷史中消失，既未消失，何來回復名譽之說？不過，令人好奇的是，芬蘭人把此戰爭稱爲「續戰」，似乎隱約中不想承認、也不認爲此戰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役。

芬蘭在冬戰贏了蘇聯，面臨割地求和；在續戰奪回俄國卡累利阿的領土，但因戰敗國身分，又割地賠款。整個「芬蘭化」前的芬蘭，一直在瑞典、俄國間以適應政治各種策略生存。也因戰後國際冷戰局勢，芬蘭似乎沒得選擇的走向強鄰所安排的「芬蘭化」。

陸、結語

回顧芬蘭近 800 年的異族統治史，從瑞典的統治到俄羅斯的接管，芬蘭從不得已的妥協到不得已的抗衡，從無可奈何的沉默政策到自我選擇的順從政策，芬蘭是存活下來了，但它的存活帶給台灣怎樣的想像空間？2009 年 9 月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台灣，當時，部份報紙社論出現某些看法：「西藏一直是北京最介意、最敏感、也是在國際社會中最無法妥協的議題。往昔達賴出訪各國，只要是國家領導人接見者，事後無不遭到北京嚴厲的報復，這可謂是中國立場最強硬的政策……台灣民眾應該清楚，這一年半多的經濟復甦，中國市場是無法忽視的重要因素」（《中時電子報》，2009）。另一份報紙的社論則說：「達賴是得台灣民心的，打壓達賴是人民所不以為然的。事實上，不僅國內觀感如此，馬政府與中國聯手對付代表和平與正義的達賴，也立即使台灣在國際間，從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追求捍衛者，淪落為專制集權者的幫凶，對台灣必有後患……這個政府正以宗主國惱火、兩岸關係必須修補為由，不待達賴結束行程，已經展開它進一步向中國輸誠的動作」（《自由電子報》，2009）。

達賴喇嘛的台灣之旅所引起這兩報對於台灣、中國關係的不同看法，顯示出台灣對中政策主張的兩極化。一派認為身處中國旁的小國就一定要像前者社論所主張的一樣，舉手投足之間都要考慮中國的感受，體現「適應政治」（Adaptive Politics），甚至走向「芬蘭化」（Finlandization），處處聽從上國指示。另一派則如後者社論，認為國際政治並不是單一面相的強權政治、現實主義，國際政治亦不能刻意忽略多元主義以及自由民主、國際組織等規範，台灣理當歡迎達賴喇嘛。

現在的芬蘭不必再談適應政治，亦不必談「芬蘭化」，最根本的原因是蘇聯解體了，國際的外部壓力頓時消失了。芬蘭對於加入國際組織或者是要向西走，向北走已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芬蘭在過去的歷史因為位於瑞典與俄羅斯之間，就一定要體現適應政治，仰大國鼻息，這種做法有常被認

爲是小國的生存之道，備受讚許。不過，不能刻意去忘記芬蘭在 1990 年代曾經因爲太過仰賴蘇聯的市場，在蘇聯垮台後，芬蘭的經濟嚴重衰退，銀行營運問題叢生、失業率飆高到 50%、政府負債占 GDP 的 60% 以上（《大紀元》，2005）。就國家的生存而言，芬蘭適應政治的模式在某些層面上有其可取之處，但也不能將芬蘭的適應政治全然套用在台灣，而要求台灣完全以芬蘭爲師，處處順從、沉默或抗衡。畢竟，這兩個國家內、外環境有太多的相異點。當世人稱讚芬蘭的「親蘇中立」或是「小狗必須知道什麼時候能叫，什麼時候不能叫」時，聽起來有些嘲諷，但芬蘭人多認同所有政策作爲均以國家生存爲前提，在此共識下，芬蘭生存的故事仍值得世人的讚賞。

參考書目

- Taipale, Ilkka, ed. (洪蘭譯)。2009 [2007]。《芬蘭的 100 個社會創新》(100 Social Innovation from Finland)。台北：天下雜誌。
- 《大紀元》。2005。〈芬蘭擺脫經濟頹勢 成耀眼的全球經濟明星〉。11月26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5/11/26/n1133434.htm>) (2009/09/20)。
- 王屏、管嫣紅(編)。2008。《國家的故事》。北京：北京出版社。
- 北島。2004。《北歐現代詩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中時電子報》。2009。〈拋開政治算計，盡快修補兩岸關係〉。9月2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2+112009090200339,00.html>) (2009/09/22)。
- 《自由電子報》。2009。〈達賴的光明磊落豈是國共聯手所能打壓？〉。9月5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sep/5/today-s1.htm>) (2009/11/20)。
- 吳祥輝。2006。《芬蘭驚艷——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名的故事》。台北：遠流。
- 孟君。2008。〈俄羅斯帝國對芬蘭的政策〉《延邊大學學報》41卷6期，頁140-44。
- 張亞中。2008。《小國崛起——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台北：聯經。
- 董小川。2008。《現代歐美國家宗教多元化的歷史與現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謝曙光、何侃。2004。《北歐五國——丹、瑞、挪、冰、芬福利社會的典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Arter, David. 1995. "The EU Referendum in Finland on 16 October 1994: A Vote for the West, not for Maastrich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3, No. 3, pp. 361-88.
- Frankel, Benjamin, and Paul Du Quenoy. 1999. "Finlandization: Could a "Finland" Status Has Been Attained for Some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an States," in *History in Dispute, Vol. 1: The Cold War*, pp. 107-14. Farmington: St. James Press.
- Kappeler, Andreas. 2003. "Nationalities Policies, Tsarist," in James R. Millar, ed.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History*, Vol. 3, pp. 1018-24.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 Kubicek, Paul J. 2003. "Finland," in James R. Millar, ed.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History*, Vol. 2, pp. 500-503.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 Lukacs, John. 1992. "Finland Vindicated." *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 4, pp. 50-63.
- Petersen, Nikolaj. 1998. "National Strategies in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An Adapt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6, No. 1, pp. 33-54.

- Paasi, Anssi. 1997.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n Finnish National Identity." *GeoJournal*, Vol. 43, No. 1, pp. 41-50.
- Ruddy, T. Michael. 2002. "Neutralism," in Alexander Deconde, Richard Dean Bums, Fredrik Logevall, and Louise B. Ketz,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 2, 2nd ed. pp. 543-58. New York: Scribner.
- Ryan, Leo V. 1997. "Finland Aspires to European Union Small Country Leadership." *European Business Journal*, Vol. 9, No. 1, pp. 43-50.
- Solsten, Eric, and Sandra W Meditz. 1988. *Finland: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countrystudies.us/finland/>) (2009/09/20).
- Soares, John A., and Peter Rainow. 2004. "Finland after 1945: Was the Post-World War II Status of Finland Indicative of the Soviet Union's Ideal Goals for Eastern Europe," in *History in Dispute, Vol. 16: Twentieth-Century European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First Series*, pp. 121-28. Farmington: St. James Press.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Finland's Adaptive Politics: Before Finlandization

Lloyd Sheng-Pao F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Kun-Shan University, Yongkang City, Tainan County,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Finland's adaptive politics before its "Finlandization." The author begins with analyzing Finland's powerful neighbourhood and its possible survival model in terms of adaptive politics. It followed by the separation of competing between Finland, Sweden and Russia. The Finland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aiwan will be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adaptive politics, Finlandization, Russification, Winter War, Continuation War